

中国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历史与风格

北大 与 清华

中

主编 刘克选 方明东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目 录

上 篇 大学旧梦(续)

第六章 西南联大: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续)	(1)
三、联大生活	(1)
1. “雨僧兄以为如何?”	(1)
2. 朱自清穿了一件很奇怪的大衣	(2)
3. 何妨一下楼·戏台和包厢·骑马骑驴与走路	(3)
4. 跑警报·看电影	(4)
5. 昆明城内的特殊“打工族”	(5)
第七章 从校长看校风——蔡元培和梅贻琦	(7)
一、校长——大学之魂	(7)
二、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8)
1. 北京大学之父——蔡元培	(8)
天生的革新家	(9)
道德理想家	(11)
是真虎乃有风	(13)
2. 来自自由派的校长——蒋梦麟	(14)
从学农到学教育	(14)
北大代校长	(15)
重振北大	(16)
不怕被老虎吞了	(20)
蒋梦麟的另一面	(24)

3. 国立北大的“末代”校长——胡适	(25)
“国无大学，乃可耻耳！”	(25)
“秦二世”与“黄蝴蝶”——北大的改革功臣	(27)
中国公学校长	(29)
忘不了的北大情	(32)
“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是一件应乎天而顺乎人的事”	(34)
三、勋昭作育，千秋师表	(39)
1. “洋翰林”校长周诒春	(39)
2. “四化”校长罗家伦	(42)
3. “终身校长”梅贻琦	(44)
张伯苓的得意门生	(44)
从教务长、留美学生监督到清华校长	(45)
“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48)
从就职演说到《大学一解》	(51)
治校风格：“吾从众”	(54)
“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	(56)
“王帽”：教育家的气度	(58)
风趣幽默的“寡言君子”	(60)
俭——廉——德：师表风范	(62)
第八章 一代大师 满园桃李	(66)
一、大师名士	(66)
1. 马神庙公主府里的古怪人	(67)
北大第一怪辜鸿铭	(67)
北大第二号奇人刘师培	(73)
北大第三怪杰黄侃	(75)
2. 红楼儒者	(81)
“我的朋友胡适之”	(81)
苦雨庵主周作人	(87)
新儒家的代表	(91)
三沈二马	(101)
“卯字号”的名人	(104)

3. 清华名师	(111)
“国宝”陈寅恪	(111)
语言大师赵元任	(116)
“清华三孙”	(118)
民主斗士闻一多	(129)
铮铮铁骨朱自清	(131)
“怪杰”刘文典	(136)
一代学人吴宓	(140)
二、满园桃李	(143)

中 篇 变迁与磨难

第九章 大转换,从英美模式到苏联模式	(146)
一、思想改造:步入新社会的洗礼	(146)
1. 学习与思想改造运动	(146)
2. “拖着尾巴过关”的校务委员会主任	(148)
3. 迈不进门槛	(150)
4. “原罪”感	(152)
二、院系调整,“以俄为师”	(153)
1. 燕园的原主人	(153)
2. 北大搬迁与台湾新竹清华	(155)
3. “全国一盘棋”	(156)
4. 反复调整,各司其事	(158)
第十章 探索中的新气象	(162)
一、清华新风的形成	(162)
1. 名教授讲基础课	(162)
2. 时代潮流与“清华特产”	(164)
3. 体育铸造出的精神	(166)
二、新清华:缔造荣耀	(167)
1. 叱咤政坛的清华人	(167)

2. 执科技界之牛耳	(169)
3. 核事业中建立功勋	(170)
三、冲出传统之后	(171)
1. 继承才能发展	(172)
2. 从专家路线到群众路线	(174)
3. 清华能否培养工程师	(176)
4. 北大的迷茫	(177)
四、校魂：马寅初与蒋南翔	(178)
1. 马寅初：“无为而治”	(178)
2. 蒋南翔：“基层出政策”	(181)

第六章 西南联大：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续）

三、联大生活

1. “雨僧兄以为如何？”

西南联大时期，学校生活清苦，参考资料又不多，许多教师在上课之余，为免肚皮打架，常常以知识充饥。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学生一起去听自己喜爱的教师上课，既学到了自己所不知的知识，也忘了饥饿。

当时常常去听课的一位是冯友兰先生，冯先生在汤用彤先生讲魏晋玄学课时，总是每堂不缺的去听。但冯先生严谨，没有留下什么趣事。唐兰（立庵）先生对古文字学造诣很深，讲课从来不带讲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很是吸引人，因而当年联大听先生讲课的，除了中文系的同学外，还有两位教授，一位是物理系的王竹溪先生，另一位是哲学系的沈有鼎先生。本来王竹溪先生学物理的来听古文字课已经使同学们惊奇万分了；而那沈先生却又是联大有名的不修边幅的人之一，他那满脸胡子茬儿，光脚穿一双又破又旧的布鞋走进教室的样子，使同学们一辈子都难忘。王竹溪先生在这时就开始研究汉语字典编纂问题，后创制了“新部首检字法”，编成《新部首大字典》（1988年出版），共收51100余字，是我国收录汉字字数最多的字典。他主要利用业余时间独立完成，历时30余年。

最有趣的是中文系的刘文典先生上课。刘文典先生也是章太炎的学生，骄傲怪僻，不合流俗。五四时期在北大当教授，后来大概觉得教授不如校长好，1929年便于安徽大学任校长（刘是安徽合肥人），不想刚上任，就发生了学潮，因是从北大过来的人，刘按北大老传统办事，对领导学生运动的同学多所维护。最后事情闹大了，捅到老蒋那儿，蒋召见他，说了一些既无理又无礼的话，刘大怒，伸手指着老蒋说：“人家开始说你是新军阀，我还不信，就今天的事看，你就是新军阀！”蒋自然大怒，把他关了起来，据说还要枪毙。后来学生请愿，蔡元培先生等也全力说情，大致说他有精神不正常的老毛病。不知是老蒋真信了蔡等的话亦或本来就不想杀他，于是来了台阶赶快就下，将其免职了事。刘于是又回北大教书，不久又不甘寂寞地做清华

代理中文系主任。后来在西南联大讲“庄子”、“文选”等课。他上课有特点，闭目端坐，只讲自己心得体会和研究成果，徐徐道来，真如庄周梦蝶一般。因为讲得好，有心得，便吸引了同样爱讲心得的吴宓（号雨僧）也去听。吴宓每次坐在最后一排，刘先生闭目讲课如故，只是讲到自己认为独到的体会的时候，总是抬头张目向后排打望，然后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每必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人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掩口暗笑。

2. 朱自清穿了一件很奇怪的大衣

联大有校训“刚毅艰卓”，用来反映西南联大的师生生活，再恰当不过。教师学生除上课学习外，只有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衣、食、住、行了。学习、教书，事涉高雅，其情形前已有述，在此不讲，就讲普通平常的衣、食、住、行诸方面。

对于衣着，北大、清华、南开一向均不太讲究，在北平时也就从上到下一身学生服而已。到了西南联大，条件艰苦，制服依旧，但质量已有下降。学生流行的服装一般是褪了色的黄制服、黄制帽，天气冷了，外加一件黑色棉大衣，这是绝大多数同学一年四季唯一的服装。其次也有少数蓝布大褂，西装较罕见。女同学穿蓝色布褂者较多。都是从平津、长沙、香港沿途带过来的。脚上皮鞋占半数以上，多是本地产的3元一双的货品，其余胶皮底鞋和粗布鞋也不少。袜子多是露着脚跟的破线袜，有的也穿着补丁打了一层又一层的粗布线袜。当然男女同学都有个别穿的出格的，女的浓装艳抹形色轻佻，同学称之为“妖”，男的奇装异服逾越常规的，大家呼之为“怪”，妖妖怪怪，全校不过两三人耳！

与学生比，教师服装形色稍多一点，西服革履者有之，长袍大袖的也有，也都是教授常穿的服装，布料不一定好，但那是一种相当于学生制服的教师服装，大家都这么穿惯了。教师中“奇装异服”的也有，其一是吴宓，吴先生爱穿紧身细腿的旧式西服，配上脖子上面的一个炸弹形的脑袋，在联大校园内，很是显眼。而物理系的吴大猷先生，一条黄卡叽布裤子，膝盖上补了像大膏药一样的补丁多个，在联大教授们穿的各种有补丁的衣服中也是很有名的。

最有特点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最敢穿的为朱自清先生。那时朱先生的生活很苦，有9个孩子，一部分住在老家扬州，家庭负担很重，所以特困难，加上先生至情至性，衣服的钮扣丢了，也不钉，找根绳子来系上，到了冬天，买不起大衣，就买一领云南“马锅头”用的粗毛毡披在身上，头上戴着有大耳的帽子，用来御寒。南开大学的李广田教授回忆，他在昆明大街上

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朱先生，他说：假如不是他老远地脱帽打招呼，我简直不敢认他，因为他穿了一件很奇怪的大衣，后来才知道那是赶马的人所披的毛毡，样子像蓑衣，也像斗篷，颜色却像水牛皮。……以后我在街上时时注意，却不见有第二个人是肯于或敢于穿这种怪大衣。即使这样，朱自清先生在联大仍很乐观，他曾用改过的诗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来与同事共勉。至于鞋袜，多数教授和学生一样穿本地产的皮鞋或布鞋，许多教授的鞋子和学生的一样，前后开口。哲学系沈有鼎先生不穿袜子穿着又旧又破的布鞋上课的情景常让同学们一辈子不忘。

西南联大的吃，开始还可以，由于物价尚未上涨，温饱大多不成问题，还可不时改善一下。但40年代后，随着通货膨胀，师生都感紧张。尤其是学生，远离家乡，许多人无经济来源，更为窘迫。那时学生伙食自办，大多数学生都参加自办的大众厨房，每人每月6元（随物价上涨而涨），另外也可吃包饭或小厨房包饭，甚至个别在教授厨房私包，自然这是质量和价钱都层层相应往上涨的。大众厨房的伙食一般是早上稀粥就咸萝卜丝加几粒花生豆；中晚八人合吃四个小菜米饭，10天一结帐时间或可以集体打一次“牙祭”。也有极少部分同学，每天只能大饼两块配辣椒豆瓣酱加白开水了。教师的生活比学生稍好一些，但也很困难，尤其与战前无法相比了，随心所欲的吃是不可能了，三天两头聚会也被取消了，连像金岳霖这样的美食家都不得不强迫嘴巴紧闭，只能偶尔设法弄点西点解解馋。一些单身教师和青年助教便也和学生一样自办“饭团”，改善生活就难以提上日程了。

3. 何妨一下楼·戏台和包厢·骑马骑驴与走路

与食相比，住总是好对付。西南联大的住也是五花八门，学生住在新校舍的都是土坯茅草房，一个房间20张双层木床，两两相靠，用床单或蚊帐隔成无数个小单元，虽很热闹，却有时也很吵闹，彼此不免影响。也有个别学生在外租房住的。而住在昆华中学南院和在工学院的学生，都是二层小楼，条件则比新校舍要好一些。由于学生课多、活动多，因而对住处还不太挑剔。对教师来说住处就更重要一些，有家庭的要安家，有家没家的都要治学。除单身教授和青年教师由学校给安排住处外，一般教授多自租房子住，条件好的在城内租洋房、花园，但为躲空袭，一般人都在市郊单独或合租农村房子住，吴大猷、黄子卿、闻一多、华罗庚等等都是，民房的条件自然比城内楼房差多了。

从长沙临大到蒙自、叙永分校再到昆明，教授住过的房子很多，其中也就有不少值得回忆的事。在蒙自分校时期，文法学院教授住在法国银行及哥胥士洋行，大概有楼上楼下、大大小小的区别，这些教授便中西民主结合，

用抽签方式决定，当时房间紧，两人一间均无怨言，那时哥胥士洋行的土楼上，可结聚了中国“文”界人物的诸多精华，闻一多、陈寅恪、刘叔雅、陈岱孙、邵循正、李卓敏、陈序经……。那时闻一多先生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总不去。于是住隔壁的郑天挺先生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引得众人大笑。后来此事便成为一个典故，闻一多先生也有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不过此后，闻先生也下了楼，和大家一起散步来了。蒙自时期“级”别最高的是女生宿舍，当时女生借住城内早街周伯斋宅，这是一座三层小楼（学生给它起了雅号名听风楼），数十人住里面，晚自习后由校警护送回来住宿，因当地不安，蒙自县长便派保安队40名驻在附近的三元宫，待遇之高，男生称羨。昆明时期，宿舍仍很紧，许多单身教授也是几个人住一间。有一个时期陈省身就与华罗庚、王信忠合住一间，早晨起来便开玩笑。后来，这群单身教授又异想天开地租了军阀唐继尧的花园的戏台，陈省身住的是其中的一个包厢，而陈岱孙、陈福田、朱自清、李继侗四位教授住在戏台上，这看戏的演戏的都可称千古绝唱了。

租房住在城外的教授，不仅涉及到住，而且牵涉到行，昆明那时也有公路，甚至也有汽车，但大多教师坐不起汽车。于是便想出各种代步工具，周培源先生上课，总是骑马代步，同学们在校园里一看到他的那匹棕黄色马，便知周先生来了。也有的教师骑驴，个别教师如陈友松教授还有一辆破自行车。但大多数教授既买不起马，也买不起驴，只有凭两脚步行了。如吴大猷、黄子卿先生家离学校都很远，每次上课往返步行要二、三个小时。当然住在城外也有安静安全的好处，许多教师如闻一多、华罗庚因合住一室还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4. 跑警报·看电影

以上说了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联大生活在其他方面也是很苦，比如一个时期，昆明常受日军飞机空袭，上课便不断地被空袭警报打断，联大房舍也常被炸，伤亡的事件也常发生。有时学生便不得不在荒郊野坟堆上上课。由于敌机有时也光“打鸣”不“下弹”，所以有一次金岳霖先生便决定冒一次险，警报响后，仍在那里看书，写他的《论道》，但这次飞机下了“弹”，而且炸了，幸好金先生未伤丝毫。金先生也正是因为跑警报，把已近完成的数十万字《知识论》的手稿给丢了，只得重新写，使这本大作晚出了好几年。还有一次跑警报的轶事是关于刘文典的。警报响起后，刘文典像别人一样疾走，这时一位早已很有名也在联大任教的新文学作家和往常一样也急着向某个方向走，刚好碰上刘文典，刘一看站住，正颜厉色地说：“你跑什么！我跑，因为我被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

那位作家尊重他是前辈，没还言，躲开了。在飞机炸弹之下，刘先生仍如此怪异，非常人能及。

生活苦，便有苦中作乐的法子，以工学院学生来说是听音乐和体育运动，对大部分同学来说则是散散步，到“民主墙”看看新闻，或者到茶馆一坐，体察民情、风俗，更可到昆明四郊观看自然风光。最为普及和最受学生欢迎的可能是去电影院去看电影，昆明城原有一家电影院叫大众电影院，能容两三百人，放一些关于抗战的影片，也放外国电影。有趣的是放外国电影时，因为没有翻译过来，电影院便派一个拿着水烟袋的人坐在银幕前做即时的口头翻译。这个翻译不知是不懂或是很幽默，常常在翻译时离开原对话随意为之，信口开河。有一次剧中在一家咖啡店里，侍者对来客说了两句什么，翻译便译为“要哪样？要饵块？还是要米线？”国外哪有饵块和米线？就是在中国，也只有云南有。就是在联大时期，同学们欣赏到了《翠堤春晓》、《蝴蝶梦》、《大独裁者》等脍炙人口的外国影片。

5. 昆明城内的特殊“打工族”

西南联大时期，学校经费有限，教授工资从1937年9月起已经是七成发放（以50元为基数，余额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所剩无几。1940年后虽改为十足发给，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严重，尤其是昆明物价更在大后方居于首位，联大师生和广大人民一样成为饥饿线上的挣扎者。1943年以后，联大教授的每月薪金已由战前的300多元降至实值仅折合战前的八元三角，仅能维持全家半个月的最低生活。陈寅恪在形容当时昆明及后方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程度时，曾有两首诗，相当形象：“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陈先生是当时少数部聘教授之一，又有中央研究院的兼职，尚且如此，一般教授，其生活可想而知。

为补贴家用，教授们只能想办法，开始是出卖手中值钱的东西，如书籍、衣物等。吴晗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转让给云南大学图书馆。这时最怕有人生病，吴大猷先生因夫人有肺结核病，花钱买药很多，因此他可能是联大教授中最早摆地摊的，抗战初年托人从香港、上海带来的东西都陆续地卖出去了。黄子卿先生，1941年得了疟疾，不得已，卖裘、书以购药，拖了一年才好。黄先生曾写诗记述此事，诗曰：“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草堂诗好难驱疟，既典征裘又典书。”至今读来令人怆然。这些都是从国外回来的洋教授啊，不想会有如此处境。东西卖光了，便开始想方设法挣钱。闻一多先生挂起治印的招牌，而且从梅贻琦、蒋梦麟常委到冯友兰等10多位名教授都主动予以推荐。凭着他的才艺、名望，

他得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他 1944 年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卖。航空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教授合作研制“西曼”牌墨水来卖，据说可与派克墨水媲美，畅销昆明。常委梅贻琦家里也不好过，梅贻琦夫人一开始便想去做工，后来被人家认出来，堂堂校长夫人，如何敢雇，最后只好做一种叫“定胜糕”的点心到昆明冠生园去寄卖，冯友兰教授夫人则炸麻花卖，以补不足。也有的教授开小商店、茶馆、餐厅。

无力自己经营的只好出去谋兼职，许多教授便在昆明的其他大学、专门学校和中小学兼课，或者去教家馆等。有的教授为云南土司当幕僚，官寿文、墓志铭，换取酬金。尽管如此，有的教授生活仍很困难，汤用彤等教授一度只能喝粥度日。师范学院副教授萧涤非，尽管曾先后到中法大学、昆华中学、天祥中学教课，但生活依旧困难，不得不忍心把初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先生有诗《早断》记载此事：“好去娇儿女，休牵父母心。啼时声莫大，逗者笑宜深。赤县方流血，苍天不雨金。修江与灵谷，是尔旧山林。”当时教授们对这种生活有“十儒九丐”、“啼饥号寒”的感叹。教师兼差既多，不免对工作有影响，个别不负责任者，上课缺课、迟到、由助教代课的情况都很严重。有一教授在战地服务团兼差，上课照例迟到早退，有时甚至快下课才到讲堂，讲完了赶快去团里办事，上课成了“副业”。有的教授任意合并课程，缩短学时，甚至有一个晚上讲完一门课的现象。

同学生活因物价上涨，也很困难，本就无经济来源，学校有贷金，也跟不上物价涨速。至于穿衣、书本、日用品更得靠自己解决。为了维持学习和生活需要，学生兼差打工的现象也很普遍，他们所作的事大小都有，从坐办公室一直到当公共汽车售票员。许多同学担任昆明的家庭教师、中小学兼课教师。甚至打铁、挑水、拉警报、放午炮的杂活也有联大学生参加。有个小笑话，有次联大赛足球，时间是正午 12 点，同学们都成群结队地去看。有位专管放午炮的同学也去了。同学们问他“你怎么有空来了？”他说：“我要来看足球，就把午炮提前放了。”

学校和各系也想方设法为同学们创造勤工俭学的条件，学校图书馆、资料室都为同学提供有偿服务的机会。工学院的一些系组织了“清华服务社”，开办锯木厂、冰厂等，也吸收不少同学参加。有人估计，联大一半以上的同学做过各种各样的兼职，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经历，锻炼了同学，促进了他们的成长。

第七章 从校长看校风——蔡元培和梅贻琦

一、校长——大学之魂

旧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缓慢，从京师大学堂开始到1949年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的大学在国际上影响不能说有多大，但至少国内有名的也还出了那么几所，而且确实也培养了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的人才，研究本国学问的学者自然不必说，就是研究科学技术的后来也出了不少的响当当的世界有名的专家。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在很长时期还是以解放以前培养出来的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为支柱和骨干。这些人才的成长和成功有各种因素在起作用，比如离不开他们自己的努力。但有一点，他们几乎都承认，他们的母校奠定了他们成功的基石，而且对母校的风气倍加称赞、眷恋。

民国时期的名大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奋斗历程。由于历届政府都忙于政争、内战，对大学教育极不重视，因而每一所学校几乎都受过各种苦难之折磨。在这种背景下，每一学校发展的背后都离不开某一二位著名大学校长的维持支撑。而且给学校以深远的影响。如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1913—1936年任职）、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1918—1925年任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1919—1948年任职）、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1911—1919年任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936—1949年任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917—1927年任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31—1948年任职）等等，还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这些大学校长，经历不同，出身各异，从事教育的目的和因缘也各不相同。但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各人都有自己的教育思想，都热爱教育工作，而且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教育思想落实到大学教育中去，给学校校风、学风带来深刻的影响，从而使各个大学，虽都为高等学校，却在教和学上都自成特色，各领风骚。在这些校长对学校的深刻影响中，突出的代表可以从民国时期最有名的北大与清华看出来。

北大如果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的北大，清华没有梅贻琦，也不会有当时声名雀起的清华。不仅蔡、梅二人的教育思想已经深深地影响到北大和清华的教学活动之中，就是二人的一言一行、为人处事、气质爱好，亦给两校以深刻的影响。蔡元培虽长校只有10年，但与北大的联系在离校之后一直没有中断，北大师生一有机会便想方设法让他重新回来长校，他可以说已是北大的精神象征了。梅贻琦长校17年后去台湾，仍不忘清华，晚年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实际上，二人仿佛与北大、清华融为一体，成为二校之魂了。

二人之爱北大与清华及清华、北大之爱二人，可以说几乎到了“自私”的地步。实际上，蔡元培一直把北大当着他的北大的，北大也把蔡元培当着她的蔡元培，清华对梅贻琦和梅贻琦对清华又何尝不是如此。北大和清华两校历史上任过校长的均不止十数人，但唯二人得两校师生之钟情，其中的道理在哪里？的确值得我们回味和总结。试问，今天各著名大学的校长诸公，才识可能均不在蔡、梅之下，但又有哪一个人对所长学校的影响，以及该校师生对其敬爱程度及蔡梅二人？又有哪一个校长有自己独到的教育思想而且能给该校以深刻影响？今天的各大学，除名称不同、专业不同之外，各自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大学缺少灵魂啊！

二、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1. 北京大学之父——蔡元培

作为近代中国历史较长而又影响最大的北京大学，其历史上遭过多次劫难。但历经大难而不死，这与许多校长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张百熙、严复、胡仁源、蒋梦麟等等均有贡献，在其任上的许多校长中，也不乏好学深思之名士，在其他方面均有成就，但均没有蔡元培长校后对北大改革之大，影响之深，流风所及，已不止于校园一隅了。梁漱溟先生说过：蔡先生的一生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预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也就是说，蔡元培一生最大的功绩，是通过改革北大而开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他的成功，当然不止于他一人的努力，而且有历史“运会”即社会需要的一面。但各种原因归结起来，蔡元培起的作用是首要的，因为单有历史机运，没有蔡元培本身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内在资质，换了一个人，也是不可能在

短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功的。他的经历、品格、器局、识见、性格、天性、气度，均是他教育影响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天生的革新家

蔡元培，字鹤卿，号子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早年受旧学教育，曾极崇拜宋明儒家，言动拘谨，近于迂腐，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恪守古训，如母亲生病，曾刮臂和药以进；母亲病故，不顾家人劝阻，坚持要把古人时文中瞎吹的“寝苫枕块”古制真来实行。1883年15岁的他中了秀才，1889年乡试中举人，1890年赴京会试告捷，1892年补殿试取中进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翰林院编修。此时蔡元培才26岁，可谓春风得意，仕途坦坦了。

其实蔡元培天生是一个不喜守旧的人。比如他作八股时，就不是老老实实恪守八股老套，而喜用古书通假字调换常字，并用古书中奇特的句法变换常格，这种别出心裁的不同凡俗的怪八股自然令那些老八股几乎看不懂。不懂自然要装懂，又以不懂者必定古也的定理，蔡元培的八股文在主考官中便得文章“古藻博雅”的声誉，殊不知是不守本分的蔡元培在玩“文字游戏”呢？平淡无聊的翰林院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甲午战争以后国势日衰、救亡新议纷起之时，他便被当时维新派宣传的西方新学所吸引。戊戌政变失败后，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无望，便断然决定托疾请假，决绝仕途，离京南下从事教育，也许是对旧制度绝望太深，他朝封建叛逆者迈出的第一步便惊世骇俗。以后更趋向新学，与时俱进。

此后，蔡元培的主要活动不外乎教育界，偶涉政治，也没有离开文化教育机关。他一生参加活动多，但几乎每一件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898年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监督，鼓吹进化论，提倡民权和男女平等，为时所不容，辞职而去。1901年秋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采新法教育学生，不因袭陈规，勇于革新，培养出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洪允祥、李叔同、王世澂、胡仁源、项骧、贝寿同等高材生。此后，1902年春创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年底，组成爱国学社任总理，倾向革命，“公言革命无忌”，鼓吹暗杀主义，试制炸药。1904年秋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光复会，任会长。1907年6月赴德国留学，以41岁的老学生身份，到德国半工半读，次年入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文学、人类学等课，对美学、伦理学发生浓厚兴趣。辛亥革命发生，奉孙中山之召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倡导发展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为教育宗旨，主持改定学制，修订课程，小学废止读经、初小男女合校，主持制定颁布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壬子癸

丑学制”。因不满袁世凯专制，1912年7月辞职，9月再度赴欧游学。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应孙中山之召回国，“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赴欧留学。1915年6月与吴玉章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一时以勤工俭学赴法者不下千人，后来许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1917年任北大校长，多所改革，风气所及，被于全国。1926年初《京报》副刊发起征集十位“新中国柱石”活动，蔡以得票最多名列第一。而他对北大改革的作用和意义，尤为人们所肯定。1920年至1921年，1923年至1926年，又两次出国考察教育。1927年后，创办大学院，任院长；创中央研究院，任院长；与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

蔡元培一生独立特行，处处求新，乐于改革，他一生任事之多无以复加，但每有创制，不谋常居，用古人的话说，他是属于“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那一类。不居功自傲，不坐吃山空，而乐意在新的领域内有所作为。仅以教育界的作为，以“壬子癸丑学制”、北大改革、中央研究院中的任何一个开创之功，均可不朽，而蔡竟得占三。

蔡元培不仅乐于创新，而且敢于创新，别的不说，仅以婚姻一事为例。婚姻大事，归于中国旧传统中最旧的那一类，是极不易变也一般人不敢轻易变的东西。1900年6月，蔡元培夫人王昭病逝，很多人关心这位名翰林婚事，为之作媒。不同凡响的蔡元培提出了五项择偶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子可改嫁；（五）夫妇若不合，可离婚。这些条件，今天看来，可以不称之为条件。但在当时，在大清国的时代，封建礼教很沉重的时代，这其中的每一条均可惊世骇俗了，尤其是后两条，足可使封建卫道士大骂蔡元培大逆不道的。但蔡终得知音，江西黄仲玉，不但是天足、识字，且工书画，孝于亲，并欣然接受蔡元培的条件，于是订婚。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结婚时，又出新花样，以上绣“孔子”两字的大红幛代替当地习俗悬挂的福禄寿三星画轴，以举行演说会代替闹洞房。据说这演说会也很热闹。来宾陈黻宸（介石）引经据典，阐述男女平等的理论，支持蔡元培。另一来宾宋恕（平子）则主张男女双方应以学行相较，不同意平等之说，戏称：“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从平等？”蔡元培笑答道：“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如此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举动，曾使许多人骇怪不已。

蔡元培这种不断求新，敢于和乐于求新的天性，使他敢于在接手北大

之后进行改革。而既从旧社会来，又有新社会思想的双重优势，使他比一般人更能抓住旧学校的病根，更能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说，蔡元培是一个革新家，他不是一个守成家或建设家，因而他虽在北大长校10年，但真正在校只有五年半，实际上哪怕不用5年半，也够了。善于创新，是蔡元培的特长，这可能也是他与梅贻琦不同的地方。

道德理想家

蔡元培在北大的成功，固然有他措施得力，择才有方，八方相助有关。蔡元培自身的言行人格，能够使人佩服，也是一个方面。蔡元培受中国传统教育影响很深，而且早年是极其恪守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人，后来受西方伦理学的影响，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并以此作为新的公民道德的标准。让学生学识丰富、道德高尚，一直是蔡元培教育理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一向主张道德文章并重，尤其强调德育的重要性，他曾说过：“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助其为恶，无益也。”他认为，像北大这样的大学，不仅要把学生培养成将来在工作上称职的人，而且还应负有培养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常常以砥砺德行的话来勉励学生，而且采取措施增进师生的道德修养，如带头倡导在北大建立进德会便是。

蔡元培自己十分重视个人道德的自我修养，并形成了十分突出的人格道德魅力。早在南洋公学时期，学生们对蔡元培“无疾言，无惧色，无倦容”的作风，就“皆大悦服”。到了北大之后，他平等待人，办事民主，热爱学生，廉洁俭朴，是非鲜明，言行一致，因而能得新旧各派拥护。上及教授，下及学生职员，无不受到他人格的影响。比如他上任伊始进校门对校役脱帽鞠躬，他创办《北京大学日刊》将校务公开，他反对师生贴大小字报相互攻讦而主张公开讨论，他不顾危险在五四运动中为营救学生四处奔走等等。

蔡元培高尚的人格，给北大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任鸿隽在回忆录中称他具有“处处为人无我的真精神”，“凡与蔡先生相识有素，有相当机会观察先生举动行为的人，都可以承认平生不曾看见先生有过疾言厉色的时候。他这样谦让和蔼，温良恭俭，纯是发于自然而不是要拿这些道德来引起人家的好印象、好感想。……蔡先生的对人接物，似乎有两个原则，一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或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的方法相互了解或处理。”“但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

退、莫不假借的斗士。”冯友兰先生也回忆说，在蔡先生身边，感同光风霁月。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种气象。沐浴这种气象之中，就不能不为他的人格所感化。陈独秀也称赞过：“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而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做的事，都是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卑不亢，刚柔相济，人格十分伟大。”

俗话说，做好人不难，难得是一辈子都做好人。而蔡元培可以说就是这样清风亮节一辈子的人。他一生恬淡寡欲、廉洁奉公，想的是为国育才，为公众服务，从不为一己打算；他不愿为官，更不想发财，虽几任要职，却从未置产。有不同时期几事为证：1912年他出任教育总长，身居高位，仍生活俭朴。一次，几个客人身着笔挺礼服，前来向他道贺担任总长。此时他正在洗衣服，出门相迎时，仍身穿短袄，双手沾满肥皂沫，边揩边迎。这使客人颇窘，蔡元培急忙说：“没关系，有劳诸位了，请里边坐，我为着没事，就旧事重作，随便洗洗衣服，只可是难为诸君了！”堂堂总长自洗衣服，这在民初可是令人大跌眼镜的事，蔡元培却坦然为之，可见思想之开放。1917年任北大校长，月薪600元，在当时可说不低，但他仍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有学生回忆，有次走过校长室，一个小饭铺伙计提着菜篮，说是送饭给校长吃，好奇的他以为是什么山珍海味或至少是三盘四碗，便打开一看，竟是一盘木樨炒肉，一碟醋熘白菜，和几个馒头。其实，大量的钱他都捐助公益事业或接济学生去了。

由于蔡元培一生两袖清风，自奉俭朴，生活清苦，以至直到晚年仍是全家租房而住，就是书籍也分散寄存在北平、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没有一个集中置放的地方。1935年下半年，在蔡元培70寿辰前夕，北大蒋梦麟、丁燮林、王星拱、胡适、罗家伦等人，鉴于上述情况，出于对蔡的敬重，发出倡议，号召蔡的好友、学生集资，为他修建一座房屋，作为他七秩寿辰的贺礼。这个倡议得到数百人的响应。当年9月7日，蒋梦麟等联名写给蔡元培的祝寿笺说：

我们都是平日最敬爱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一日是先生七十岁的寿辰，我们都想准备一点贺礼，略表我们敬爱的微意。我们觉得我们要送一件礼物给一位师友，必须选他所最缺少的东西。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没有一个归拢度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现在我们很恭敬地把这一点微薄的礼物献给先